

腥风血雨中的艰难求索

1932年5月8日,淞沪停战协定签订后的第三天。在军乐队的前导下,一支“社会童子军团”队伍从上海北火车站经南京路,浩浩荡荡地回到团部,沿途受到广大市民的热烈欢迎。走在队伍前列、高举着十九路军军部所颁锦旗的人,正是中队长杨延修。上海各大报刊纷纷报道当时盛况。

杨延修出生在江苏省泰州市一个手工业者家庭,因家境穷困,7岁就来上海投靠摆皮匠摊的叔父。14岁进洋行当小茶房,练习生,后来受聘于法商保太保险公司担任高级职员。当时他白天工作,晚上进夜校补习,并积极参加夜校学生会活动。“九·一八”事变后,杨延修出于不愿做亡国奴的悲愤心情,参加上海市商会社会童子军团等群众团体的抗日救国活动,开始了理想的追寻和抗日救国道路的求索。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他与大部分团员当即组成随军服务团,投入抢救难民、运送伤兵的战地救护工作。直到淞沪停战协定签订后才撤回上海。在此期间,杨延修的战友罗云祥、应文达、毛征祥、鲍振武等四位团员惨遭日寇捕杀。童子军四烈士为国牺牲的忠勇事迹激起海内外爱国人士的义愤,也更坚定了团员们报效祖国的决心。

1936年夏秋之际,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通过杨延修等在一些中、上层洋行华员中活动,发起建立上海洋行华员联谊会。随着上海抗战形势发生急剧变化,“洋联”受到越来越多的干扰。地下党组织决定,由卢绪章、杨延修等组成核心小组,将“洋联”转型为“华联同乐会”,并获工部局颁发的团体登记证。杨延修当选“华联”理事兼秘书处主任。他在上层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又深入基层发动群众。在杨延修他们的领

为党掌管钱袋的红色特工(上)

◆ 沈惠民

20世纪80年代,电影《与魔鬼打交道的人》风靡一时。红色商人杨延修与他的领导卢绪章(原国家外贸部常务副部长),就是主角原型人物。他们以经商为掩护,接受周恩来单线领导,在上海、昆明、成都、重庆等地,从事秘密联络和地下经济工作,积极为党筹措经费。在这条隐蔽战线中,杨延修是中共秘密机构广大华行副总经理(建国后出任上海市第一任工商局副局长),他以“大老板”“财神爷”的面目,日夜周旋于朋友和“魔鬼”之间。在复杂的政治经济环境中,他肩负特殊使命,披肝沥胆地为党掌管“钱袋子”,由此出现一幕幕惊心动魄的故事。

导下,“华联”曾拥有会员10000多人,形成较大社会影响。上海总商会会长虞洽卿曾对杨延修他们感慨:“几十年来,我一直想为洋行华员办一个俱乐部,始终未能实现,现在你们办得规模如此宏大,为众所爱,我实在高兴。”

不久,根据上级安排,杨延修到昆明领导昆明业余联谊会工作。这是地下党领导的又一群众性进步团体。杨延修以“昆联社”为基地,通过读书会积极开展党组织活动,同时与昆明市市长裴存藩等国民党上层人物和工商界人士建立了广泛联系。1940年初夏的一天晚上,一批国民党武装宪警突然包围“昆联社”,认定杨延修他们“受共党分子利用搞非法活动”,当即查抄了一批进步书籍。杨延修临危不惧,据理力争,随即以攻为守,找到国民党云南省党部书记长陇体要那里“讨个说法”。因为查无实据,为了平息民愤,国民党昆明市党部先是发还了被搜去的大部分书刊,接着由陇体要出面宴请杨延修他们表示道歉,声称今后将继续支持“昆联社”活动。一场刀光剑影的捕杀,顷刻消弭在觥筹交错、握手言欢之中。

广大华行的秘密使命

为了筹措抗日救国经费,同时有个职业活动地点,1933年,杨延修与卢绪章、张平、田鸣皋、郑栋林“五结义”,集资300元(当时币制)在上海成立了广大华行。

所谓“华行”,是区别于上海滩上大批的外国洋行。刚开始,只是在邮局租了个邮箱,用邮售方式经营西药、医疗器械业务。当时租借了上海天潼路怡如里29号的大亭子间,分隔成内外两间,里面一小间作为杨延修和他的妻子朱学明的结婚新房,外间作为广大华行办公室。白天由朱学明协助照应;到了业余时间,五位合伙人才到办公室处理业务,所有开支都精打细算。一年后,随着业务迅速发展,办公地址迁至宁波路47号香港国民银行5楼。

1937年至1938年间,随着卢绪章、杨延修、张平先后加入中国共产党,广大华行也成为中共上海地下秘密联络点之一。他们在这里成立读书小组,组织进步青年学习革命书刊,参与抗日救亡活动。不久,广大华行被中共南方局改建为党的秘密工作机构,由卢绪章任董事长、总经理兼



■ 参加革命初期的杨延修、朱学明夫妇

党组书记,杨延修任副总经理。

周恩来为广大华行明确了三大秘密任务:一是交通联络工作,为党的高级干部在国民党统治区往来提供方便;二是情报工作,通过国民党内部的关系搜集情报和经济资料;三是经济工作,为南方局、八路军办事处等机构提供和调节经费。

1939年至1941年,蒋介石集团接连制造了“平江惨案”、“皖南事变”等一系列血腥暴行,中共在国统区的组织遭到严重破坏。面对严峻局势,毛泽东提出白区工作方针:“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周恩来为此重新安排国统区内的党组织:以八路军办事处、新华社日报社等公开单位为第一线;原各省、市地下党组织为第二线;再建立绝密性质的第三线机构。万一形势突变,第一线被迫撤退,第二线遭到打击瘫痪时,第三线仍能扎根白区发挥战斗作用。

广大华行有较好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基础,商业网点遍及半个中国,便于掩护党的工作,周恩来将广大华行选为第三线机构。从此,广大华行由党的一般地下机构转为隐蔽最深的地下经济事业和秘密机构,专做地下经济工作,为党提供和调节经费。

1943年,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邓颖超等领导人在重庆红岩村接见杨延修。周恩来亲切勉励杨延修要更好地为党的特殊战线工作:“你在白区的工作,你的工作就等于战场上一个师。你就要当好这个资本家。而且要当得很像大老板,要住得很像样。”

广大华行的资金积累与业务发展比预计的要快,为党做了许多提供与调节经费的工作。杨延修以“大老板”的身份,先后与工商界人士合办了一些企业,如昆明中和药房、贵阳广和药房、与爱国实业家卢作孚合办民安保险公司等。为了增加保护色彩,一些国民党军统、中统头目,包括蒋介石侍从室专员等,都被拉进来担任广大华行顾问、董事、监事,并把黄金、美钞、金圆券都存在广大华行,广大华行则给他们很高的利息。

随着全国战争形势的发展变化,1945年秋,广大华行由重庆迁回上海,1948年春又由上海转移到香港。在此期间,广大华行先后在昆明、成都、西安、贵阳、衡阳、桂林、兰州、汉口、天津、香港、广州、台湾、青岛、沈阳设立分支机构和附属机构,并相继开拓东京、伦敦、印度、香港、南洋等地市场,共开设20多个分行和办事处,到1948年底资产达202万美元,成为有一定实力并在国内外享有信誉的企业。

筱文艳:生我不负淮剧情

乔谷凡

19.在家里是贤惠的媳妇

筱文艳成名后,给她带来了什么呢?金钱,美酒?洋房,汽车?这一切都与她无缘。她依然忙忙碌碌,日出而作,日落却不能休息,而是要为了生活奔波、挣扎。筱文艳在舞台上是一名角儿,在家里是贤惠的媳妇。她并没有忘记婆婆一家帮助她破笼高飞的恩情,像中国所有善良的劳动妇女一样,她把全家的生活重担,毫不犹豫地背在自己身上,背不动也要背,纵然是因不堪重负而跌倒在地,她也不肯把生活的重担推向一旁,情愿自己被压得喘不过气。

1942年到1943年,筱文艳在汇泉楼搭班唱戏。这汇泉楼,实际上不是戏馆,而是茶楼,地址在顺昌路的拐角上。她挂的是头牌,虽然每日拿的包银,从数字上来看是十分可观的。但是,当时她家里足有十五张嘴要吃饭,经济主要依靠她。大伯一家大小有五口,婆婆、小叔、姨妹、表妹,加上她的两个徒弟,以及她自己一家三口(大风死后,又生了一个男孩,乳名双喜,大名建国)。此外,凡有难的来投靠她,不论是老艺人还是小妹妹,只要自己有碗饭吃,就会分出一半给他们。

抗日战争时期,每户配给一点“户口米”。筱文艳有时也挤着去买“户口米”。一清早直奔米店,已经是人挤人,米店门刚一开,你争我抢,女人争不过男人,小矮的抢不过个高的,筱文艳嘴里嚷着“别挤,别挤”,谁听她呀!这里不是舞台,没人听你的,她被人潮挤得脚都不能着地,挤不进去,只能往外钻,无端的还挨了安南巡捕一棍,头上被打出一道血痕。她提着空布袋回家,匆匆包扎一下,下午还得照常演出。

她公家当时也在汇泉楼做茶房,碍着筱文艳是头牌花旦的情面,老板答应他们在汇泉楼的楼梯口,摆一个卖汤圆的小摊。糯米粉哪里来?跑单帮跑来的。开始,筱文艳只是在幕后帮着做点事,譬如剁馅、磨粉、包汤圆等等。婆婆心里是极爱护和疼怜筱文艳的,认为她是角儿,一天两场戏已经够劳累的了,再说她的收入不低,如果只顾自己的小家庭,也许



日子会过得不错。为此,他们不让筱文艳参与卖汤圆。

筱文艳拗不过婆婆,但是她有过食不果腹的经历,尝过饥饿难忍的滋味,在她的脑中种下了一个根深蒂固的观念——一个家庭总得未雨绸缪,有点积蓄,以防万一。筱文艳在汇泉楼演出时与谢长钰同班,谢长钰是筱文艳的前辈,年轻时曾经誉满大江南北,特别是他真假嗓结合的唱腔,令多少观众倾倒,每次演出都会赢得观众热烈的掌声。如今年纪老了,嗓子也不行了,真假嗓结合不起来,演出时经常听到观众“吃虾皮”的声音。所谓“虾皮”,就是观众“嘿嘿嘿”的嘲弄声,筱文艳每当听到这种声音,浑身会起鸡皮疙瘩。此外,当时有一个叫俞艳芳的老艺人,徽班出身,后来改唱京戏,曾经红极一时,成为老班的摇钱树。老板为了控制她,给她吃鸦片烟、红丸子,弄得她人不像人,鬼不像鬼。当她人老了,老板就一脚把她踢开,结果倒毙在街头。艺人们为她募捐凑了点钱,才能草草葬殓。

筱文艳当时虽然年轻,刚刚二十岁出头,但是这些所见所闻,使她寒心,不得不盘算着以后的日子,不仅是她自己,还有这一家人的生活。她想在尽可能地维持一家人温饱的同时,能够积蓄一些钱。因此,婆婆不让她卖汤圆,她就瞒着婆婆去跑单帮。当然,她从小像只小鸟一样,被关在笼子里,对人头也不熟;以后,又日夜在舞台上忙碌。她之所以能够跑单帮,全靠小妹妹的帮忙。

有一个小妹妹名叫倪春香,父母在南码头开了间卖大饼油条的小店,她从小混迹于市井间,接触过各种各样的人,在特殊环境下,养成了天不怕地不怕的豪放性格。她是筱文艳的忠实观众,她的父母曾经逼她做童养媳,她因反抗而在逃家,逃到筱文艳家里,此时筱文艳已经住在南市斜徐路一家棺材店的楼上,向姓顾的老板租了间四十平方米左右的住房,一隔为三。你投奔,我收留,摊一床地铺,倪春香就这样住下了,所以两人称得上是患难姐妹。倪春香看到筱文艳为一家人的生活忧虑,便动员她合伙跑单帮。所谓跑单帮,就是到浦东去买米、面粉和煤炭,然后拿到浦西去卖掉,这样就可以赚点差价。

24.可惜惠子一点也听不懂他唱的什么

哥哥的清国菜谱上有一道“宫保鸡丁”,惠子忙乎了半天,把鸡肉切成细细的肉丁,终于炒出了一大盘,热气腾腾地端到袁朴生面前,袁朴生愣了一会,打了个喷嚏,筷子犹豫豫豫伸下去,但很快就是一副风卷残云的样子。连声说好吃好吃。惠子站在那里,眼泪噗噜噜地往下掉。大家都笑了。只有衫门昂立紧绷着脸,深深地瞥了她一眼。

那天收工特别晚,惠子给袁朴生温了一壶酒,备了几样小菜,那三个徒弟又累又乏,都赶紧回家了,哥哥和嫂嫂也出去应酬了。父亲和母亲口味清淡,他们每天都是这样,简单吃过晚饭,就搀扶着出去散步。除了佣人十八郎,家里就剩下惠子和袁朴生。不知道不是那盘宫保鸡丁的缘故,袁朴生兴致很高,跟惠子要酒喝。虽然他不太喜欢清酒,但喝起来还是大口大口的。惠子在一旁看得有些呆,就问道:袁桑在清国的时候,每天都这样喝几杯么?袁朴生显然听不大懂她过于生涩的汉语,但意思却是明白的,便深深地点头。然后,他和蔼地说,以后如果再炒宫保鸡丁的话,请不要把糖醋当成盐放了。这道菜除了多放盐,还可以放些辣椒。又说,在窑上干活的人,出力流汗多,所以口味重,盐也吃得更多。惠子听懂了他连说带比划的意思。慌忙站起来鞠躬道,对不起对不起,袁桑!心里却是把美智子恨透了。这只能生育的闹母鸡,真是处处跟她为难啊。为什么要这样跟惠子过不去?幸亏袁桑很给她面子,明知那道菜做得非常不好吃,当着大家的面,他却装得狼吞虎咽的样子。袁朴生笑着说,你哥哥都告诉我了,为了让我胃口好些,你非常尽心。太谢谢了。我真的很喜欢你烧的菜呢!

这个温暖的夜晚让惠子再次确定袁朴生是个心地善良的好人。尽管她并不能听懂他讲的每一句话,但她能理解他每一个充满善意的表情,她喜欢听他充满磁性的声音,甚至呼吸的鼻息。是的,温暖。这个男人的身上,有一种让人感到安谧的温暖的气息,她觉得跟他一点也不存在交流上的障碍。平常她从不喝酒,但是为了让袁桑高兴,她从爸爸的地窖里拿出一坛上好的清酒,给自己斟了满满一

大碗。清酒就是这样,初进口的时候感觉平淡和略微地酸涩,就像品橄榄一样,慢慢地劲儿就上来了,最后,就把人不知不觉地放倒了。惠子在这个夜晚决定把自己豁出去了,只要袁桑开心,她怎么喝都可以。才喝了几口她就觉得浑身发热,额头冒汗;再喝,且是与袁桑连续干杯的呢,头就有些晕乎乎。心飞快地跳着,几乎要冲出胸膛来。她满脸绯红、眼波荡漾的样子一定是让袁桑心动了,他不再让她喝,按住她的酒杯不让她再倒。显然袁桑也喝多了,看样子他的乡愁上来了,推开酒杯,有些摇晃地走到窗口,对着黑魇魇的夜空,扯着浑厚的嗓子,咿咿呀呀地唱了起来。

可惜惠子一点也听不懂他唱的什么,只是觉得那曲调婉转高亢,又如怨妇诉。一轮明月在乌云密布的夜晚,只有一轮沉没在云层中挣扎、突围。一曲唱罢,袁桑的眼睛里竟然蒙着一层薄薄的泪光。惠子就把自己的帕子给他了。他没有接,她就上前替他擦拭了。她依偎在他宽厚的胸膛里了。他犹豫了一下,下意识地把她推开;而她则紧紧地抱住了他。他还想推开,但显然已经没有了抵抗的力量。半晌,他轻轻地叫了她一声什么,凭直觉,惠子判断是一个女人的名字。那应该是汉语里的一个单词。非常温柔的发音。但肯定不是叫的她。她感觉,那个女人一定在千里之外。在一刹那间她的情绪受到了影响。

已经第五天了,袁朴生还是在重复着教徒弟们捶打一张泥片。没有理由。叫你们打,你们就得打。袁朴生脸上没有表情,或者说,一直保持着一种凝固的皱着眉头的表情。他手里也举着一个枣木的“搭子”,其实就是个木槌。反复地在一张泥片上捶打。神经病啊。第一天小野次郎就咕嘟道。骂吧,反正他也听不懂。衫门昂立调侃道。怎么可以这样!鲤江高寿瞪了他们一眼。毫无疑问,他捶打的泥片离袁师傅的要求比较接近。你们的姿势不对,手势也不对。要用韧劲而不是用蛮力!袁朴生对着衫门昂立和小野次郎说。你们看他,鲤江高寿,他已经打得很不错了。鲤江,你可以歇息一会儿了。可是,鲤江高寿说,我觉得跟师傅您比,我打的泥片还很差劲。拍马屁!衫门昂立小声嘀咕。

国壶

徐凤

